

Ideology And Diplomatic Game

意识形态 与 外交博弈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冷战”爆发以来，国家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是这个外交博弈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罢了。可以说，“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两个制度“阵营型”外交活动的政治灵魂。

尽管现在世界已进入后冷战时代，但是，国际社会冷战思维却没有停止其存在。在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背后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动机和影响。

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处理好意识形态视阈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外部的所有外交关系，是极度敏感的政治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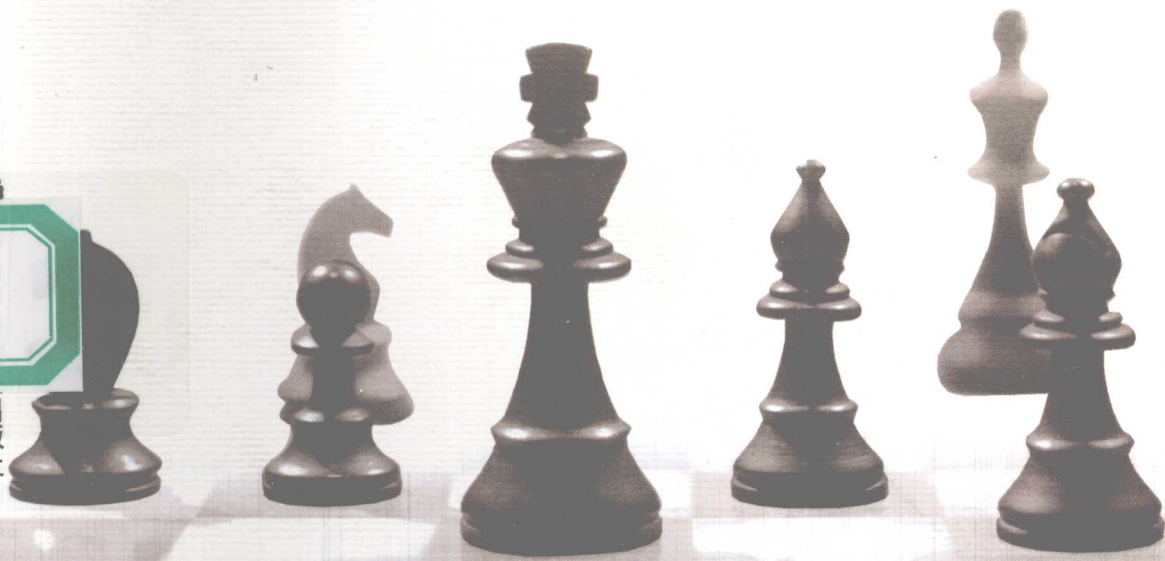
「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

姜安 / 著

信

.2

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THE CHINESE FOREIGN DIPLOMACY "GAME"

意识形态



外交博弈

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

「新近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

魏英/著



Ideology And Diplomatic Game

意识形态 与 外交博弈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冷战”爆发以来，国家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这个外交博弈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罢了。可以说，“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两个制度“阵营型”外交活动的政治灵魂。尽管现在世界已进入冷战后时代，但是，国际社会冷战思维却没有停止其存在。在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背后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动机和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处理好意识形态视阈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外部的所有外交关系，是极度敏感的政治话题。

「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

姜安 /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识形态与外交博弈——兼论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逻辑/
姜安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35-3741-7

I. 意… II. 姜… III. 意识形态 - 关系 - 中美关系 -
研究 IV.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10159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 dxcbs. net](http://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燕华印装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236千字

定价: 22.00元

导 论

仅从外交意义分析,最近十多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确为不言而喻的事实。一种情形来自于这样的声音:“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民主和平、霸权稳定、文化殖民等声音甚嚣尘上;一种情形是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成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文化现象,它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对意识形态问题新的争论;一种情形是作为冷战的政治遗产冷战思维在冷战后仍然存在;还有一种现象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声明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尊重世界发展多样性的同时,突出强调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将国家主义意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可见,意识形态问题有重新被重视的政治迹象。

当然,就国家间关系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格外敏感。原因在于:(1)这是两个意识形态具有巨大差异性甚至对抗性的国度;(2)其意识形态被社会制度的选择进行了“异制性”的安排;(3)事实上意识形态的外交运用在两国之间从来就没有断绝过;(4)这种情形在“西风”相对强势和“东风”相对弱势时更加会引起我们的关注;(5)而两国之间的战略结构性矛盾使意识形态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冷战”爆发以来,国家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这个外交博弈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表现罢了。可以说,“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两个制度“阵营型”外交活动的政治灵魂。尽管现在世界已进入冷战后时代,但是,国际社会冷战思维却没有停止其存在。在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背后始终存在意识形态的动机和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处理好意识形态视阈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外部的所有外交关系,是极度敏感的政治话题。

这恐怕是作者写作本部著作的基本动机。

就国家间关系而言,中美关系是中国所有涉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鉴于中美关系多元性、立体性、复合性、复杂性、战略性和超时空性等特点,在评价和分析中美关系时,实际上有许多技术路线、逻辑线索、研究角度和思维模型可以参考和选择。因此,试图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和视角,测度和评价中美两国关系可能会得到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不过,考虑到影响中美两国关系诸多元素的非平衡性,并鉴于意识形态问题在两国之间的格外敏感性和重要性,本著作将主要以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为研究之核心原点和切入点,重点考察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问题,梳理、测度和评价美国对华外

交政策的逻辑动因、运行机制和基本影响,并试图为中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美国外交战略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咨询。

需要指出的是,本项问题的提出旨在强调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非凡价值和存在意义,关注意识形态与美国国家外交战略之间的紧要关联性,尤其是考察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并试图寻求中国相关国家安全战略的价值向度和外交对策。所以如此,至少在于:

第一,历史证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单位,意识形态早已成为整体社会进步生存链条和生态体系的重要环节,关乎中国命运的存在和发展。人类发展史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作为民族或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元素和重要技术手段,意识形态的存在具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注意到:中国文明进化的历史年轮中几乎都印刻着意识形态深度影响的文化痕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20世纪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经历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时代性变迁具有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透过20世纪的历史走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经历重大转换和整体跃升的国度。在世界上几个大国的历史进化比较中,还很少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受到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很少有哪一个国度能像中国那样,受到意识形态那么强烈的影响。这期间,我们既存留着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基因,又被迫承载着西方殖民精神的奴役,同时又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时代的激烈碰撞中荡溢出新文化运动的激情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还在新的时代变迁中与时俱进地继承、培植和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特历程,使其具备了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再塑性的特点。只要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历史逻辑:近代社会,中国的全球化完全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进行的。殖民化成为中国经历全球化的经典性注释。在西方社会进行长达百年的全球性贫困化大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东方文明的文化体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虽然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激荡和雄起,但是,这毕竟是以巨大的灾难和失落为其代价而承载起悲剧的历史命运的。其中,东方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碰撞与融合成为该时代中国社会命运的一个经典事例,从而以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方式深深地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现代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经历了“热战”和“冷战”阶段。以“一战”和“二战”为主要标志的“热战”,为中国进行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深广的远程国际背景。从喜剧上讲,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引爆了中华民族科学与民主、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文化体系的诞生,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新的思想元素和新的科学内涵。从悲剧上讲,文化的被侵略和文明的相对失落同时使中国付出了历史性代价。“冷战”及其遗产给中国文化安全带来的影响同样是敏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冷战”的出笼是有悖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发展走向的。无论是能动的,还是被动的,“冷战”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它在以特殊方式强化中国意识形态政策的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化走向发生了一定的位移或错位。

对 20 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进化和整体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宏观性回顾和总结是富有教益的：20 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意识形态早已作为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的一部分，构成了这个国家文明进化必需的基本元素，或者说，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国整体社会进步生态体系和生存链条的重要环节。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宣布：中国是一个受到意识形态极度影响的国度！意识形态关乎这个民族、政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21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前提至少来自 20 世纪意识形态世界的经历。满载 20 世纪意识形态历史脐带与期待的中国，在 21 世纪无论向何处进发，总免不了受到往日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关照和导引。可以说，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成长的经历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国家利益的捍卫都是极其有益的历史资源和成长资本。中国文明进化的意识形态境遇以及全球化视阈下中国的文化安全和人文精神的成长都是无法回避的时代性命题。尤其是在 20 世纪中国共产党与意识形态的紧密互动关系中，后者对前者存在和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使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该项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精神、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和选择，特别是对国家长远战略利益的捍卫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的维系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命题。

第二，意识形态是当代国际事务当然的“政治语言”。世纪之交，国际社会一直围绕许多话题进行争论：诸如，全球化与多极化、文明冲突与文化安全、霸权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市场与贸易、区域化与一体化等。在这些坐标点上，国际社会人文学者迅速作出了反应，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在世纪之交的争论热点。其中，前者宣布：在全球化视阈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必将以共产主义在 20 世纪的失败而告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终结所有精神文化现象的主要元素和有利武器，这同时意味着几乎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走向将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路向为主要参照；后者则肯定地认为，当今国际事务的全部矛盾关系，主要反映在文明间的冲突上，即反映在由各个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组成的文明单位间或宗教间的冲突上。这一冲突将会在不同的文明结构板块的断裂带——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北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上展开。尽管这两位学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不能成为我们考察和思索世界事务和民族、国家命运的唯一科学范式，但是，由他们所揭示的问题一直成为最近十余年来被思想界普遍关注的对象确为毋庸置疑的事实。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思想逻辑颠覆社会主义者对其精神信仰的虔诚和追求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命题的揭示至少具有这样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全球化、文明冲突、文化安全等无论以独立的政治单位或文化事项存在，还是以日益缜密的网络化的方式加以联结，无论意识形态发生怎样的历史性变迁或整合，还是国际社会制度和价值信仰进行怎样的安排，总会触及到中国的国家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在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原则与全球化的文化运动发生融合或冲突的情境下，可能会关涉到这样的命题：东方文明

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儒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关系,以及具体到谁是文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和最终受益者?一句话,谁将是文化的主导者,谁将在文化世界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并最终地被淘汰化?进一步讲,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对于当代中国文明来说,到底是促使其衰落的魔鬼,还是催生其跃升的天使?

就东西方关系而言,如果说,近代西方社会对东方国家实施殖民化和全球性贫困化大转移政策,导致后者社会经济全面落后,从而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上遭受威胁和侵略的话;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行经济制度安排,西方国家利用高科技推行新的技术战争,获得对落后国家经济与技术上的优势和胜利的话,那么,近十多年来,以文化或文明为主轴,以所谓自由和民主为基点,以西方主义征服民族主义为基调,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中心,实现以西方文明为范式的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征象。于是,文化安全便自然地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敏感话题。与此相悖的是,必然地在民族国家中掀起民族主义浪潮。其实,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早就作出了一定的反应:除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而有效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实施灵活务实开明的外交政策外,被认为是标志中国第四代人精神成果之一的《中国人可以说》等著作的问世,曾一度反映出中国一些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掀起的“传统文化热”,赋予了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的逻辑联系。于是,一种寻求民族文化现代性意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要努力之一;而福山和亨廷顿所触及的命题,在中国也被“隆重”地加以关注,相关的学术成果更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呐喊,并逐渐地物化为对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锁定,即寻求新的精神价值信仰,还是诚信固有的文化定位,由此长成的文化民族主义价值取向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一种重要尝试。联系到人是精神化的存在这一命题,并从民族和国家未来命运视角审视,实际上,上述事实直接触及到中国的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定位、文化发展方向以及民族文化的生存命运问题。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冲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而敏感的角色。这是因为,对中国而言,自1840年以来,近代国际体系所造就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世界秩序和制度安排,使中国等落后国家出现了“三弱”态势,即社会政治结构孱弱、经济实力虚弱、国家安全脆弱的状况,即使是在当代世界权力体系分配中,仍没有彻底改变旧有的结构性失势的局面。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境下,这种“弱势”的国际定位便极度地突显出意识形态的特殊政治地位。在国际社会政治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中,意识形态政策的国家化策划、制定和实施,在当下应是国家和政府的主要政治行为。

世纪之交,综合国力的比较愈加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气象。在“国力”成长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特有的气象成为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中国的发展是可敬的。但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可能被敌对势力制造出发展“悖论”。面对中国

的发展,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之扑面而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妖魔化”等论调甚嚣尘上。这便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理由。在“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发展论”的对峙中,充分地突出了意识形态影响的至关重要性。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已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中国的发展对平衡世界力量关系,对地区和平与世界和平都会带来新的和平气象也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当一些西方人士危言耸听地宣称中国威胁的存在,并预言中美两国的冲突即将到来等,从而,在国际社会给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制造了巨大的生存困境。国际社会发展的事实表明:当下,尽管我们在积极地奉行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外交政策,但是,冷战后时代的国际社会并不完全是月到风来,气象宽舒的和平世界,其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国家利益之间的激烈争夺、国际社会文明的冲突仍然存在(尽管我们并不否定世界文明存在着融合与和谐共处的方面),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可以说,意识形态一直是国际事务的当然“政治语言”,由不得我们忽视它的存在。

第三,意识形态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敏感因子。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关键敏感期,意识形态问题空前突显出来。在这里,我们先揭示几个重大事实背后的政治命题:一是“法轮功”现象的出现部分反映出主要在所谓弱势群体中人们精神信仰的失落化和畸形化问题;二是“六四”风波在所谓“政治精英”群体中,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仰危机问题;三是“马加爵事件”(有一些律师准备为其辩护、有企业准备注册“加爵牌”商标等现象)突现一些人道德世界中正义、良知等精神价值体系的危机。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法定地位和事实上的优势地位,尽管我们承认上述现象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在由精神信仰、政治信仰和道德信仰所组成的思想体系上,官方意识形态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也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分析起来,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十分复杂的:社会主义运动受挫,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冲击的宏观政治背景;经济全球化制造了以资本、消费、商业、市场、民主、自由、网络等为主要元素和逻辑框架为核心的新制度安排和新经济生态体系,其负效应给中国意识形态设置了新的时代性难题;社会转型中利益冲突与价值体系重新建构的负效应是深刻的社会背景;部分执政者政治腐败,影响了党的公信力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多样性思潮的存在以其多元化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其负效应对人们价值观念已经形成了巨大冲击等等。毫无疑问,我们正在新的时代平台上面对崭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而同时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和逻辑结构也需要进行重新的组合和调整。令我们兴奋的是,中央已经及时地开始发动新意识形态的启动工程。实际上,从这一意义上讲,“与时俱进”、“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词汇和政治信号。它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南和导向作用。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新的时代背景中,在坚持原有的意识形态基本原则和灵魂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既符合时代特征,又能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力的新意识形态。

我们仍然确信当下中国的社会稳定性是可信的。但是,就当下中国问题而言,还存在着两个关键的结构性难题:内部政治稳定和外部国家安全。内部政治稳定主要由以下因素制约:一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冲突,并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而造成非稳定性前提;二是整体社会发展中部分腐败,主要是部分政治权力主体政治腐败带来政府公信力下降和政党政治权威部分丧失;三是社会发展的诸多要素存在结构性问题,包括国民经济生活水平差距拉大、地区发展非平衡性突现和国民政治心理承受力以及政治认同感失衡等,这种“集合式”负效应影响社会稳定性;四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政治稳定系统和链条的非完善性,制约社会和谐式和可持续性发展等。其中,最现实的关键性问题是台湾问题。尤其是随着台海局势可能出现的进一步恶化,政治稳定问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素会急剧增加。由此产生的政治稳定层面的系列性问题有连锁并发的可能性。外部国家安全由以下因素制约:一是社会主义运动受挫,中国社会主义问题国际化。冷战期间被掩盖的相关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际生存和发展问题空前突出;二是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疆独分子”活跃,中国的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非安全因素;三是中国发展悖论问题,可能引起的中国的国际被动。诸如“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即为国际敌对势力之不义之举;四是中美关系敏感而脆弱。未来中美关系模式或路向可能是中美对抗,或新冷战结构,或结成同盟关系。我们以为,中美关系的最大可能性模式或路向是新冷战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台湾问题是其主要支点和政治障碍。于是,由中国内政和外交两个视角分析,直接会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台湾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台湾问题的负效应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的破坏度:一是可能影响整个中国政局稳定和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顺畅执政;二是可能引发整个中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导致经济崩溃;三是可能导致中美两国过早地军事冲突;还应当意识到的是,又由于以下问题使上述问题更加紧迫而可怕:一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统帅性、征服性和整合性正受到许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二是中国的国家安全缺乏国际联盟的有效支持和国际安全机制的政治维系和军事保护;三是随着台湾本土化趋势的加强,台湾民族独立主义有可能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考虑到2008年的特殊时间点的临近(陈水扁准备在此时实施具有“台独”意义的所谓“新宪法”政治),台海局势可能出现紧张对峙格局,出现以武促统,以武拒统的局面等。因此,台湾问题是对中国政府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和政治心理的巨大考验。危机中的新意识形态的建构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事实上,中美关系是中国所有对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就美国对华政策来说,在一定意义上讲,许多外交政策的动机(甚至包括一定的冲动)都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美国的经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制度选择和国际定位等等均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和矛盾。这种巨大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构成了中美两国之间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说,研究和透视中美关系存在许多大门的话,意识形态视角的评价和分析可

能是打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研究之门的一把钥匙。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曲线中,意识形态的支点、坐标和导向作用格外明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一直在发生着异乎寻常的影响。从杜鲁门到卡特再到布什,从冷战时代的冷战思维到冷战后的冷战思维,从遏制战略到超越遏制战略,从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到卡特政府人权外交的出笼再到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实施,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情结从来都是一个重要引擎。从美国对华职能部门的外交功能分析,无论是国会、思想库,还是政府机构,意识形态的指针意义是非常鲜明的。从中美之间的“经典”外交案例看,人权、台湾、入关、贸易等事件或问题的冲突中,包括“中国威胁论”的盛行等,大都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整个国家发展和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联系到中美之间存在的战略结构性矛盾,联系到历史上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问题中的悠长恩怨,并充分考虑到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思虑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可持续性、危机性,则该选题的重要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地之一,该项课题的研究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科学咨询作用。目前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领域,学术界已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前期成果。如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约瑟夫·奈的《美国霸权的困惑》、刘金质的《美国国家战略》、郝雨凡的《白宫决策》、王伟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周琪的《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王逸舟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杰里尔·罗赛蒂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约瑟夫·拉彼德的《文化和认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亨特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孙哲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刘建飞的《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沃尔特·米德的《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这些代表性成果围绕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深度研究,这成为我们研究该项命题的重要思想基础,也使我们获得了必要的操作上的信息和信心。

从学术界研究状况看,主要在以下问题上获得令人兴奋的成果:

——关于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问题。该命题的研究是整个课题研究的逻辑前提。在这一命题中至少要涉及到意识形态涵义、特制及其演变发展规律的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历史传统考察;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基本元素和政治文化逻辑;意识形态外交类型的梳理等。在这些命题上,国内外学者均有一些成果。如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中,特蕾西的意识形态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摩根索的意识形态分析等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不同的结论。在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传统的考察中,亨特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和周琪的《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都从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元外交曲线角度进行了研究；在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基本元素的整理和分析中，刘金质的《美国国家战略》和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等一些著作均有相关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元素体系。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关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决策系统与主体性测度问题。许多学者主要在较为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行为主体中进行考证。一般地从思想库、利益集团、国会、媒体和政府等行为主体上研究外交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应当说，关于上述行为主体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有相应的成果，如史密斯的《思想捐客》、阿伯尔森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孙哲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罗赛蒂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等。这些成果主要围绕思想库的外交功能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外交介入、国会对美对华外交的影响、意识形态与媒体政治等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在该项课题中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不过，如何将决策主体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政策进行有机联系的科学考证和分析是学术界的缺陷，在该项领域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缺憾。

——关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的逻辑支点。该项命题主要有三种路向：基本原点、主要元素、技术路线。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逻辑原点是国家利益，强调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因。当然，学者们坚持认为，国家利益存在着结构性和体系性问题。不同的学者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元素的认定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强调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元素是国家利益、美国主导、资本主义和“黄祸论”等，大多数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元素是：民主、人权、制度悖论、“中国威胁论”。在意识形态外交的技术路线的求证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包括国际干预、文化输出、制度安排等。

——关于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历史嬗变。国内外学者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嬗变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在具体的历史分期上存在不同意见。学者们一般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冷战（20世纪4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冷战后（苏东剧变—“9·11”事件）、“9·11”事件到现在。主要从宏观角度进行测度，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世界体系的对峙和历史时代发展，进行考证和梳理。

——关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政策评价。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实质的评价上。大多数美国学者的结论是，美国实施意识形态政策符合自由社会和人类正义，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当然行为，并认为人类在该问题上的最终归宿是以全世界的自由与民主的和谐发展终结以往的意识形态的争斗。有的学者强调美国意识形态政策的霸权定性。大多数中国学者强调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质是实施帝国主义霸权。他们主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如有人认为，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属于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人强调美国意识形态外交

是为了建立美国文化霸权秩序等。在该问题的研究中,中外学者缺乏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政策动因、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成果。

——关于新世纪意识形态外交的基本走向和中国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提出了一些观点,断定意识形态已经开始成为被终结的对象,不会发生如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前对峙。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基本没有令人振奋的学术成果问世,基本上在两个技术路线上运营:解释和宣传国家和政府的外交行为和对国外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注释。中国学者在该项领域的研究特征是缺少系统成果和缺乏学术独立性。

由此可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行为,但是,从政治文化学和国际政治学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国际性意义分析,尤其是围绕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进行学理研究,却不是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学术行为,其学术成果并不系统,也不够深入,国内学者的学术成果更是鲜见。当然,这并不表明该问题的非重要性,反而会促使我们倍加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我们正在通过该选题的努力工作试图达到这样的期待目标:本学位论文试图在学术界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围绕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政策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力争在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逻辑、决策系统、逻辑支点、历史嬗变、政策实质和中国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策动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以期获得新的认识。进一步讲,本项课题的努力:通过科学合理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梳理美国对华政策之意识形态动机,考察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文化源头,测度美国外交战略的文化特质,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影响,为中国的美国政策提供相关的材料和政策咨询。

总之,中美两国的关系创造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在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外交层面上分析,中美两国缔造了依靠意识形态(当然包括其他一系列重要元素)进行着政治辩解、文化认同、道德宣传和行为合法化工作的外交“神话”。中美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间关系的实证性和经验性经历表明:企图回避或超越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或融合的行为或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它既无法真实地回答中美两国产生分歧的历史动机,无法有针对性地描述两国之间深刻而久远的文化冲突或融合的原因,也无法寻觅到两国外交逻辑链条的基本线索,还无法洞察两国国家战略的历史缘由和文化根源,更无法为建构国家间和谐共处的新型安全关系提供真正的良方。考虑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在国际社会尤其在美国掀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种种舆论和论调的甚嚣尘上,并鉴于中国正在唱响的“和平发展论”的深刻背景及其战略意义。由此,思索到中美关系间所有涉外关系中较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深度研究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尤其是考察、梳理和评价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并相应地策动中国外交战略便当然地成为本部著作的主要职责。

前言^{*}

撰写本书的动机在于：寻找一种解释和说明中美关系的新的元素、新的样法、新的态度和新的价值向度，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文化动机，解读具有较大异质性差异的两个国度外交关系气象生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并期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模式进行一次全新的梳理和考量。

研究中美关系的理由在于：中美关系问题是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领域。美国为当今世界最强势国家。美国国家的势力半径早已触及太平洋周边几乎所有国家。中国必然地与其发生并已经发生诸多复杂而敏感关系。事实上，中美关系的历史流变昭示：美国早已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策划必须重点考虑的外交因子。

以意识形态视角研究中美关系的动机在于：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以文化因素，特别是以意识形态视角进行测度和梳理的努力并没有形成一种产生广泛影响的现象。而此种情形却与两国关系的政治气象极不相称。冷战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早已被打上了意识形态化的深刻烙印。两国间因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在外交关系中的冲突案例不胜枚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阻碍着彼此关系的友好发展。在一段时期中，怀疑、敌视、诋毁似乎成为两国间独特的外交气象。即使是雅尔塔体制已经宣告结束，世界进入到冷战后时代，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法则中仍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影响。“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的猖獗，昭示着国际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并没有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已经终结”。事实上，中美两国的所有外交问题从来就没有也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国际社会的政治组合和权力分配在大国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制定和履行的逻辑前提是国家间权力制衡关系所导致的结构性安排以及战略选择。当然，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以特有的政治性、利益性、立场性、价值性等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是微妙而复杂的。就像分水岭上的一颗巨石可以左右河流发展的方向一样，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必然地参与并影响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从一开始就在影响着相关国家外交政策的流向。正如笔者在本书所言，在古代，西方政体的权威主要靠意识形态领域中最高权威——神来确立。如，在苏美尔，它的权威靠的是恩利尔

^{*}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2006—2009年度国家一般课题：《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国际理解能力培育模式研究——基于国际政治观教育视角的考量与测度》之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BEA060019。

神。当巴比伦人超越了苏美尔人时，他们就把自己的马杜克神提高到众神的首位，后来的亚述人又把阿舒尔置于众神之首。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培育出特殊的意识形态映像——自由民主的雅典和相对的纪律严明的、寡头政治的斯巴达。东方中国则以儒教观念确立并提高了封建政体的合法性。当近代国家面对民族主义的挑战时，威斯特伐利亚政体以主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确立了西方国家政治关系之间的一个基本理念和文化认同。

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史都在其漫长的文明进化中制造了一系列这样的经验主义的例证：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与政治现象的发生紧密相联，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作为所有政治单位的文化传统的重要因子和基本元素而存在，任何国家的国家公共政策的实施或涉外行动的展开几乎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外交也会自然地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光荣传统”。不仅如此，意识形态给国家的所有行为同时制造了必须或当然厘定参照的精神坐标和行为指南，并依靠意识形态的诠释和宣传，维护国家外交公共政策的威望、声誉及其合法性、使命性、神圣性的价值存在，以期获得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政治、法理和道德认同或尊崇，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目的。意识形态既是一个国家生存意志的价值取向和民族道德伦理的思想向度，又是一个国家生命存在和延续的内在驱动力和最大政治宗教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张力和实现国家政治资本增殖的文化源泉。意识形态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我们无法主观予以剔除的政治现象。

现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一个经典的外交案例：实际上，中美两国都是受到意识形态深度影响的国家。

——对于两国来说，当一国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时，以国家或政治集团为行为载体所实施的垄断世界事务，控制甚至奴役、殖民其他弱小国家行为主体的霸权思想观念和文化整体价值体系，在所谓天赋使命和自然进化的神圣理念和文化价值驱动下，与势力范围、强权政治、归属主义、独裁理念、殖民精神、征讨风格相联系，易繁衍出战争思想和冲突意识，成为国际关系紧张动荡的主要因素，并成为其实施帝国外交行为的主要思想动源。

——当宗教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从原始图腾崇拜的差异性开始，不同宗教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设计不同的行为法则，也就蕴藏着异己力量的存在。特别是当宗教无法挣脱与种族、利益、集团势力的结合时，那种巨大的差异性和矛盾基因就使宗教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归属属性。国家外交就必然地具有宗教主义化的品质。

——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扮演重要角色时，首先主要体现在国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上。也就是说，民族性的道德体系与人类性的道德体系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就其差异性而言，民族性国家外交政策使之在其利益性上更加倾向民族利益，而非人类利益。这使得国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更具有民族性。于是，以本民族利益评价国家对外决策的伦理性或合法性，就成为国际社会经常出现的一种现

象。从其功利性角度而论,任何一个国家外交政策都深受民族道德价值体系的影响。其次,民族主义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体现在“法定性”上。也就是说,一国对外政策的依据往往从有利于民族利益的角度,试图表明其政策的合法性。甚至极端化的民族型外交政策,有可能被说成是高于国际法的正确性。再次,民族主义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使命性”上。即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化的对外政策都被赋予了民族使命感、责任感,从而使其外交获得了利益的归属性和神圣感。即使这项对外政策伤害了其他民族的利益,也被解释成对本民族的必要性和有益性。

——当制度性意识形态成为主角时,从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一种制度性选择,而制度的确立也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结果。这使得国际社会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政治现象:制度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选择,利益的捍卫需要制度与规则进行政治保障,而其主要前提则来自多方面的维系。诸如,神学的护持、法律的保障、军队和监狱等国家机器的护航等,而意识形态则是利益、制度等链条进行有机联系的政治文化因素的主要因子。依靠意识形态的声援,社会统治者的利益得到了合法性、威严性和权威性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诞生是制度合法性确立的主要“斗士”。

可以说,意识形态化深刻地影响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必然地影响两国所有的外交关系的走向。

美国的政治已任是维护长期的强国地位,并依此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丰厚的国家利润、可靠的国家安全、必要的国际威严。中国的政治目的在于:赢得必要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实现快速发展,并依此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必要的国际尊重 and 实际利益。这当然符合两国自身发展需求的政治逻辑。我们探讨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是致力于一种境界的追求,做出强烈的时代回音,那就是我们并不指望能够全面地评价中美关系,但却期待能够以意识形态为视角说明两国关系发生的问题;我们并不奢望能够破译中美关系所有的密码,却保留以新的角度解释两国关系的权利;我们指望通过软文化现象的研究,表明揭示中美关系的新思路的可能性;我们奢望能借助“意识形态之船”游历中美关系之河,冲刷和洗涤阻碍两国关系的力量。我们并不是想极力渲染中美关系冲突无法避免的可怕的前景,而是试图寻找发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靠办法,目的是试图促成一个梦想的实现:避免两国间的敌意、敌视、敌对,让自由与博爱、信任与尊重、对话与合作、和谐与发展成为两国关系的主题。就像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一样,让普世的爱充满世界!就像中国政府 and 人民所期待的那样,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为世界的和谐与发展而祈祷!

最后,我们用黑格尔赞美苏格拉底的语境表明美好的意图:人类应当从事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让一个恬静的、虔诚的、美好的博爱道德形象和新的和谐的文化气象竖在未来的时空中,仿佛一支不灭的火炬永远穿越在漫漫天穹!

作者于2007年春深圳大学襟山楼

姜安

男，1963年6月生人，吉林省集安市人，中共党员，汉族，法学博士。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曾主持、参与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省教育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主要专著有：《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逻辑与人文理念》、《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等；主编、副主编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政治学概论》、《国际经济政治概论》；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道德与文明》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中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曾获教育部第七届全国高校（霍英东基金）优秀青年教师奖。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对象。广东省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获深圳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奖。